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第十二卷第三期
2022 年 10 月 頁 45-94
DOI: 10.53106/222372402022101203002

研究論文

打造地方工作者：投入與維持因素初探*

張育誠**

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收稿日期：2022 年 7 月 29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2 年 9 月 30 日。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21 年第三屆新實踐暨臺日大學地方連結與社會實踐聯盟國際研討會，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辦公室主辦。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各地夥伴在研究／實踐期間提供的資料與協助、吳鴻昌博士與蔡侑霖副教授分別在田野工作及論文撰寫期間提供寶貴意見，以及國科會提供本研究之計畫經費（計畫編號：MOST 110-2811-H-259-502、MOST 110-2410-H-255-002-），特此誌謝。

** 通訊作者：changyc79@gmail.com

中文摘要

本研究討論影響地方工作者動機與持續實踐行動的主客觀因素。本研究所稱的地方工作者，指的是其實踐行動有助提升在地地方感的行動者。基於 20 位受訪者的訪談、參與觀察以及相關次級資料，本研究做出以下結論：從鉅觀到微觀，各種社會因素觸發行動者投入地方工作，不論是讓行動者產生關懷在地的動機、行動，或是讓已有動機的行動者能付諸實踐。除了對議題的關心，這些實踐的行動更與行動者的自我實現互相關聯。隨行動者持續展開行動，其地方工作的身分逐漸明確，同時也在過程中獲得所需的各種資本，這些資本具有一定的在地專屬性，產生的鎖入效果也讓行動者持續投入地方工作。

關鍵字：地方工作者、地方創生、社區實踐、社區營造、文史工作室

Forging Local Community Workers: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Involvement and Retention

Yu-Cheng Cha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why individuals want to be community workers and how they maintain their practices. The conclusions presented herein are based on 20 interview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condary data. Social factors at different levels inspire individuals to value some aspects of the community and to better their community. Community workers often see their community service as part of their self-actualization. As they continue to engage in community service, community workers develop their identities as community workers, and the capital required for their service accumulates. Some types of capital are location-specific, which produces a lock-in effect that inspires community workers to continue engaging in community service.

Keywords: Local Community Workers,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Community Practice, Community Empowerment/ Development, Cultural and History Workshops

壹、前言

我國在 2019 年啟動地方創生政策，期待能減緩台灣在人口、城鄉發展上所面對的議題。具體來說，該政策希望以人口維持 2000 萬的整體目標下，各地方於 2022 年時移出人口等於移入人口、在 2030 年時達到人口回流地方，藉此將城鄉的人口差距降低。發展策略上，則是希望透過發展在地產業、增加就業等方式，讓在地人與移居者能夠於地方安身立命。具體的操作則是透過地方單位或民眾找尋地方特色、凝聚共識後向國發會提案，而政府端整合各部會，讓方案得以施行（行政院，2019）。

政策所對應的是台灣的人口與分布議題。總的來說，台灣的人口將逐漸的減少。金融海嘯後的 2010 年，我國的新生兒人數約 16.7 萬人，創下 1960 來最低數字。當時，內政部長江宜樺更稱：「馬總統認為，解決少子化問題，必須提升至國家安全層級」（聯合報，2011）；社論則稱，將來台灣的人口結構將轉為倒金字塔型，少數人工作養多數老年人，對國家的財政造成嚴重負面影響（莊淇銘，2011）。就人口發展的趨勢與推估來看，人口結構變化的變化更是快於預期。從近三次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的中華民國人口推估來看（2016、2018、2020），近三年（2017-2019）新生兒人數分別為 19.4 萬、18.2 萬、17.8 萬，情況較 2010 年來說沒有太大改善。在人口零成長發生時間與人數的推估上，以低推估的數字加以觀察，在 2016 年時預計零成長將於 2021 年發生，最高人數約 2,366 萬人；2018 年時的推估時間點則向前推進為 2020 年，人口高點約 2,360 萬人；2020 年則指出：「預估我國人口數已於去年達最高峰 2,360 萬人，並於今年開始轉呈負成長」（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6、2018、2020）。

除了人口數量的議題外，人口的分布也非均質，這也與各類社會議題息息相關。若以縣市為層級來看，依照內政部戶政司網站上所提供的資料，近 10 年來人口每年人口數皆減少的地區有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基隆市、嘉義市，而宜蘭縣則在近 10 年中有 9 年人口減少。在相關議題的方面，2016 年 5 月，公益交流站（NPOst）的專題指出，台灣人口分布集中，在過度密集的都會區需要面對購房、交通、治安汙染等環境承載的議題，而在人口外移的地區，除了經濟、教育、醫療、文化、極端氣候因應各面向上處於劣勢之外，也要面對人口外流無法在地就業、生活的問題。

由此觀之，作為人口與城鄉議題的對策，地方創生政策可謂非常重要。

若就地方創生政策的執行內容來說，所謂的在地產業發展，可以說是在社區營造的邏輯上更強調商業的發展。地方創生討論的經濟發展手段，並非傳統中央政府吸引資本（租稅減免、土地重劃）的各種操作，強調的是經濟、地區、居民三者間的互相扣連，期待發展具有地方特色、具民眾共識共同推動的產業。如高啟霽（2018）所整理：「『地方創生』這一名稱發源於日本，其中心思想是『產、地、人』三位一體，一句話來說，就是希望地方能結合地理特色及人文風情，讓各地能發展出最適合自身的產業」。曾旭正亦指出，地方創生與社區營造相同之處在於在地性、民間集體行動等面向，但地方創生更強調企業部門的串聯，以及更大地理範圍的整合（曾旭正，2018；蕭惠中，2018）。也就是說，地方創生的行動，不僅談經濟的發展，也更有企圖心的希望結合產、地、人三者，產生讓人能夠在自己的家鄉安身立命的條件。

的確，產、地、人的結合是重要的。地方創生背後的推論是希望在人口移出的地區發展在地產業，產業扣連於在地，工作人口也因此移入、於在地生活，經濟與人口得以成長，城鄉差距因而降低。因此，地方特色相當重要。地方特色產生行銷的優勢，讓產業得以發展，所發展的產業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固著性，

難以離開在地因此確保工作機會不會外移。另外，這種在地特色也讓其他地方的企業難以複製。

與之相應的，在地的居民也是重要的元素。畢竟自然景物或是人文歷史，都需要有人持續投入進行發掘、保存、活化。若我們觀察各地社區，則可發現各地都有些行動者積極的投入這些議題，甚至以此為生計。我以地方工作者稱呼這一群人。地方工作者涵蓋的議題相當廣泛，在地文史、環境、勞動、社福、食農、建築文物...等，都可見到個人或團體的耕耘。他們也透過各樣的活動促進在地居民的認識與參與，例如，這些人可能是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大學課程中的講師，也可能是導覽員、市集的攤商、展覽的展出者、地方報的撰文者，甚至倡議活動的組織者、政府相關計畫的承包者...等。地方工作者與地方的「地理特色及人文風情」息息相關，也促進在地民眾對相關議題的認識甚至認同，由此觀之，這類行動者對政策而言相當重要。

此外，地方工作者的實踐經驗也是政策所需的。地方特色的發掘、保存、活化是需要長時間累積的，因此，除了需要這些人持續的投入外，也需要有更多的新加入者。因此，經驗的傳承與分享相當重要。政府也了解傳承的重要性，在 2021 年（政策啟動的第 3 年）推出了相關的措施：

國發會今天宣布將推出地方創生 2.0，其中為鼓勵年輕人返鄉，將在全台補助推動成立 30 個青年培力工作站，由在地蹲點經營地方創生業務 5 年以上的青年擔任計畫主持人，發揮母雞帶小雞功能，一年最高補助 300 萬元，藉此吸引青年留鄉或返鄉，發展地方創生事業。（經濟日報，2021）

也就是說，在政策推出前已經耕耘有成的地方工作者成了政策的推動尖兵，政府希望以培力工作站的形式，使這些地方工作者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達成政策目標。

綜合前述我們可以得知政府對地方創生的規劃與推論，以及在這思路中地方工作者的重要性。地方工作者的行動本身、所具的地方知識、累積的經驗，都對地、產、人的扣連有所助益，這些是發展地方特色產業的重要因素。地方產業創造工作機會，藉此產生人口移入，長期發展下對人口失衡、城鄉差距應有所助益。

因此，本文針對地方工作者進行研究，了解其投入動機與維持機制、對在地的影響以及如何與政府政策扣連。

貳、地方工作者的界定與觀察

一、界定地方工作者

地方工作者一詞雖相當直觀，但其內涵與邊界卻相對模糊。若對社區營造、地方創生有一定的熟悉，相信提到地方工作者一詞時，便能指涉到在地具體的行動者：某人在地方進行閒置空間活化已久，她是地方工作者；某人進行在地文史徵集，他是地方工作者；某團體的收入來源就是在各社區辦理文史課程或導覽體驗活動，偶爾也推出具有在地特色的商品，這個團體在做地方工作。但這種日常經驗上的熟悉，在進行研究時是相當模糊的。

這種模糊造成研究操作上的困難。因為我們無法從主要職業或政府計畫的分類來界定地方工作者，如前所提，地方工作者工作身分可能相當多樣。若以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來看，範圍也相當模糊。就 2013 年的情況，政府各部門中與社區發展協會相關的計畫共有 54 項（李美珍、王燕琴，2016）；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更曾進行整理，得出 83 個可供地方團體申請的各類型計畫，涵蓋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社區治安、產業發展、環保生態、社福醫療各類。也就

是說，從主要職業的概念難以界定地方工作者、從政府相關計畫來看也過於廣泛。

而學術端既有的分類方式，雖提供了一些洞見，但概念上仍有差異。首先是針對返鄉者動機的研究。例如，方媛媛（2015）在 2008 年至 2014 年間訪問了 10 位受訪者，歸納返鄉因素包括厭倦城市、熱愛家鄉、家庭因素等；另一篇是梁大慶（2016）的研究，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獲得全台 385 份有效問卷，其中，在返鄉理由的部分，11 項原因中前 3 項分別為嚮往鄉村寧靜（18.19%）、父母年邁返鄉幫助（17.29%）、追求快樂生活（16.52%）。總的來看，這類的研究邏輯上是推力與拉力之間的關係，對於城市的排斥以及家鄉的嚮往，讓行動者選擇返鄉。本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地方工作者並非皆為返鄉或入鄉的身分，也包括了選擇留在自己家鄉的行動者。

另一個類似的概念是社區工作者。社區工作屬社工專業之一環（可參考林明禎，2013；鄭如雅、李易駿，2011 等），與個案工作、團體工作並屬社會工作三大方法，以社區為服務對象，透過組織與動員社區，發展並解決社區問題。而地方工作者與社區工作者仍有細微差異：地方工作者並非全都有意識的去面對、因應社區的議題。他們可能只是針對有興趣的議題行動，不必然有意識地去凝聚在地意識，或其行動並非直接針對在地議題。

既然在政府或學術分類上難以範定本研究所討論的行動者，本處依地方創生的需求，從功能的角度來界定地方工作者。本處所謂「地方」（place），除了包括客觀的地理位置外，也包括了社會關係的物質環境（material setting for social relations），例如一個工作場所除了具體的位置外，也包括了桌、椅、機具等工作設備，以及一套定義、組織工作人員的規則，同時也包括了工作人員彼此間的正式、非正式互動。除此之外也包括了地方感（sense of place），指的是人對此地主觀上與情感上的依附，或者行動者所賦予的意義、價值等。例如

一個觀光景點，在地生活的居民、曾經造訪過的遊客、未曾造訪但知道該景點的人，可能各有對該景點的感受與認識、有自己對該地的評價。

基於這樣的理解，本處指的「地方工作者」，即其行動促進場所、地方感營造的行動者，不論此行動是直接或間接促成。這包括了對地方資源的發現、保存、活化的各個環節，在進行這些行動的過程中，透過讓他人認識在地的資源，進而促進了地方感。舉例來說，有些人想讓自己的商品帶有在地的特色，因此蒐集整理相關素材，在商品的材料、設計、包裝、行銷等處加以應用，這過程讓消費者認識了該地方；有些人可能對環境議題相當關心，因此在家鄉推動環境認識與保護的行動，這也讓其他人（不論是否為當地居民）對該地點有了相關的認識。

這樣的分類提供了一些優勢。從功能的角度下定義，雖然仍屬廣泛，然而卻提供較明確的基本軸線以進行研究，且這樣的軸線扣連著地方創生的核心元素。再者，如此區分能夠保留空間以捕捉地方工作者流動的特質。不論行動者為全職投入、兼職或只是閒暇的行為，就功能而言，都對地方的「地理特色及人文風情」有正面作用，皆於地方創生推動時有直接或間接的助益。

二、觀看的視角

確認研究對象的操作型定義後，本處討論研究者觀察時所帶概念。欲討論行動者成為地方工作者的原因，單純從個人的動機或社會的影響來解釋是不足的。日常生活中常可以聽到身邊的人們想要做某些改變現況的事情但卻沒有實際的行動，地方創生亦然，日常生活中可以聽到某些人提及想要在家鄉做點事情，但也常看到許多人依然維持著既有的工作與生活模式。若從社會政策角度來看亦是如此。早在地方創生政策之前，政府即推出許多誘因吸引青壯人口在

非都會區參與地方事務。以我的田野經驗為例，在 2016 年時「吸引青壯人口參與」已是當地社區營造計畫強調的重點項目。儘管有這些政策誘因，但近年人口分布的情況仍持續往兩極發展。這可能是因為政策需要時間發酵，也可能是需要策略方向的再校準，總之，社會面的影響力亦難提出完整的解釋。

因此，我們需要在微觀的層次探究個人動機與所處環境的綜合關係。

這種綜合關係，可以運用 Elias 的形構分析作為概念工具以進行實證的探究。我們習慣將家庭、學校、社會等視為外於自身的客體，由我們來研究這個客體，但 Elias (2007) 認為，研究與思考這個社會的人，本身也同樣是屬於這個社會的。因此，他主張我們應該從一種互相依賴、彼此交織的觀點來理解社會：

人根據他們最基本的取向 (Ausgerichtetheit)、對彼此的依賴與需要而相互結合，而且據此還進一步多少不穩定的、各式各樣的權力平衡建構起相互依賴的織體或形態，例如家庭、學校、都市、社會階層或國家。

而這裡的取向，包括可以是情感的，也可能是基於「功能的分化、職業的專門化、作為家族和國家的整合、共同行的認同過程、個人理念與集體理念、對他人的敵意、或者語言和思想的傳統而形成」(Elias, 2007: 9)。也就是說，當我們試著理解社會時，可以將社會理解為一種由互相依賴的行動者交織而成的形構。

這種社會形構影響個人行動與心理的情況，Elias (2005: 49-50) 由一個簡化的譬喻來加以闡明：

我們可以設想一個簡單的物物交換的武士社會裡的那種鄉間小路，由於風吹雨淋，它變得崎嶇不平，一般情況下，路上行人稀少。這裡人對人的威脅就是大兵或盜賊的襲擾。人們環顧這些小路及四週的樹木、山嶺、主要是因為他們時刻戒備著，以免遭遇襲擊，其次才是怕彼此碰撞。在這個社

會的主幹道上生活，需要隨時準備戰鬥，需要為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免遭身體的攻擊而盡情表現感情。在一個複雜的社會，一個大城市的主幹道上其交通就要求另外一種心之窅。這裡身體攻擊的危險很小，汽車四處急駛，行人和騎自行車的要在車流之中謹慎擇路；交警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央指揮著交通，有時很有成效，有時卻無濟於事。但這種外在控制的前提是，每個人都能夠根據該網絡的需要而極準確地規範自己的行動。在這樣一個熙熙攘攘的環境中，人對人構成的主要危險是失去自我控制。要在繁忙的路上各行其道，人就要不斷根據各種情況來調節自己的行為。而如果這種持續的自我控制異常緊張，他和別人就會有生命危險。

簡而言之，Elias 的理論與實證分析，讓我們了解到那些被認為是個人心理、行為的部分，亦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

這種形構分析的方式，可以應用到社會個層次的單位。Elias and Scotson (1994) 的《*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以實證資料展現了形構分析在社區層次的應用。該書研究的地區位於英國的 **Winston Parva** (匿名)，這個約 5000 人的地區位於工業城的外圍，在當地人的世界觀中，這裡分為 3 區，第 1 區是中產階級區，而第 2 區、第 3 區雖同樣是勞動階級民眾的居地，但第 2 區的居民普遍認為自己較第 3 區優越，而第 3 區的居民似乎也接受這樣的觀點。但問題在於，後二者間在人口、社經等變數上皆相似，為何仍產生這種污名化的情況？該研究同樣點出社會形構的作用。二位作者認為，第 2 區，也就是已經在地居住 2、3 代的老居民，形成從家庭到社區的穩固網絡，讓第 2 區的居民有較為團結、佔有地方宗教、政治等機構的關鍵位置...等優勢，亦即網絡產生權力。同時，第 2 區的居民久居於此，在世代傳承下也有共有的生活方式、規範、情感的連帶等，穩固的網絡也讓這些內化到行動者的世界觀、行動中。二位作者認為，隨著社會的變化，新的居民慢慢移入定居於第 3 區，不同的生活

方式讓第 2 區的居民感到威脅，而這樣的新舊緊張關係也影響到對第 3 區居民的看法。於是這種新舊污名的關係可以看成舊居民維持其社會位置而新居民努力想改善其社會位置的關係，但第 3 區的新居民缺乏穩固的網絡與各類連帶，也就是缺乏抗衡的優勢。當然，2 位作者也提到，這不表示 2 區內部的居民間的互動都是和諧的，而是一種集體對外先於內部矛盾的關係。總的來說，這個研究讓我們看到從形構的取徑來解釋個人、社區層次的種種現象。

當然，形構分析應用於社區這個（相較於社會、國家）較小的研究單位時，或許有些限制，但 Elias 在該書導言中亦提到，Winston Parva 此一個案，可視為一種經驗典範（empirical paradigm），也就是說，由此分析所得的模型，可做為未來分析更大尺度現象時的基礎（Elias and Scotson，1994：xvii）。

本研究便帶著上述的觀點進行研究，討論地方工作者的投入動機以及這個動機如何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同時，也討論地方工作者如何行動、建立網絡關係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些行動又產生了什麼樣的人際網絡與互動影響地方工作者的行動。

基於前述對研究對象的定義以及觀看視角的說明，本研究在後續的操作上將從二方面展開。除了透過實證資料對現象提出分析架構，同時也透過這個架構與既有研究重新建立聯繫，找出在概念整理階段時，因名詞殊異或領域不同而被研究者所忽略的相關論述，並試圖進行對話。

三、研究方法

（一）方法取徑

本研究主要以參與觀察、訪談獲得資料以進行分析。在參與觀察的部分，因參與社會實踐相關計畫，我陸續於基隆、台中、桃園等地的社區進行研究／

社會實踐，這些經歷讓我了解田野實況、甚至有若干一同參與地方事務的經驗。同時，在過程中認識的地方工作者，也成了本研究的受訪者。訪談部分，本次訪談 20 位受訪者（編碼為 A 至 O、Q、Z、AA-AC），包括全職、兼職投入的地方工作者、曾經參與但已停止地方工作的受訪者（AB、AC），以及曾擔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 AA、曾經於地方政府承辦社區相關業務的公務人員 Z，對社區發展協會、政府部門的訪談主要是希望增加不同的視角作為參照。其他次級資料方面，除了報章雜誌外，主要為參與各種公開活動之紀錄，包括公開演講、社造會議、社群聚會等。訪談資料取用的原則為：受訪者皆了解本次研究的主題，且訪談、錄音、撰寫逐字稿等紀錄方式亦皆獲得當事人的同意。研究取用資料列表可見附錄。

在資料的呈現上，除了新聞報導等公開資料，所有資料皆除去姓名、具體地點等可供辨識的部分，部分受訪者敘述的內容也經過簡化、修改，這些修改的目的是在呈現本研究分析重點的同時，確保受訪者匿名。

（二）研究限制

雖盡可能的擴大資料範圍，本研究仍有一定的限制。第一，訪談資料大多屬於事後回顧的敘事，而地方工作有非線性發展的特性，因此事後回顧可能將當時的複雜情況、內心的想法過度簡化。第二，本次研究的受訪者，受限於研究者本人的田野經驗，無法觸及農、漁會等地方組織的工作人員，亦無政府單位中的觀光行銷處室工作人員，這類行動者的工作也與地方工作重疊，例如推廣在地特色產品、進行地方行銷等，本研究的訪問對象較為集中與個人（或由個人發起地在地組織）投入地方工作的案例。

第三，生存偏誤（*survivorship bias*）的問題，本研究僅有二位受訪者（AB、AC）相對明確的表示已脫離地方工作，因此無法對照篩選出更具區辨性的影響因素。產生此情況的原因除了研究者在田野過程中無法認識這些行動者外，也

與地方工作者的維持生計、生涯發展的模式有關。地方工作者可能在不同時期以不同角色進行地方工作：他們可能在忙碌的時候便以參與者、志工的方式參與相關活動，在情況允許時則可能全職投入，例如組織團隊接案、發表商品或舉辦活動，而這裏所謂的忙碌，可能是繼續就學、需要其他正職或兼職工作維持收入等。因為可以選擇投入的程度，以及地方工作累積的資料與經驗仍在，因此離開或投入地方工作的界線較為模糊。在此情況下，本處簡要說明 AB、AC 二位受訪者的概況做為參考：

受訪者 AB 年幼時曾在國外生活一段時間。2010 年前後，在書局看到在地文史方面的書籍，發現自己似乎對家鄉可以有更多的認識，加上當時的工作主要是語言方面的接案工作，也想讓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實，因此就報名參加了一個文史工作坊，活動之後更以志工的身分持續投入。這段期間他參與了幾個不同團體的計畫，或是以接案的形式幫忙在地團體翻譯資料。他離開的理由主要在於生涯的規畫，有穩定的工作是主要的目標，加上當年認識的夥伴也逐漸離開，因此他也逐漸淡出相關事務。目前他又回到國外定居，與當年的夥伴偶有聯繫。當我問及為何當時沒有把地方工作發展成一個主要收入來源，他認為當初參與時便沒有想到商業相關的事情，只是單純想了解在地、對此類議題有興趣。

受訪者 AC 同樣也是透過參與在地的工作坊活動而發展出一個在地團體。她在北部工作一段時間後返回中部，因為對地方文史有興趣，看到訊息便報名參加了地方團體舉辦的文史工作坊。活動中她與組員討論了一些文史資料運用的可能性，在活動結束後，她們便組成團隊，運用工作外的時間進行實踐。他們採集地方文史資料，運用這些素材製作各樣的節目，於社群媒體上播放，同時也接一些公、民間單位的委託案獲得一些收入並展示她們的成果、推廣在地特色。這個行動大概持續了三年左右，隨後團體進入了休眠的狀態。AC 認為最

主要的問題在於她自覺比較適合僅擔任幕後的工作，前場主持的工作讓她感到無法負荷。目前該團體已停止資料採集的活動，製作影音所需的相關設備也已轉讓，但相關的紀錄仍保留於社群媒體的頻道中，AC 期待或許有其他團隊能夠接續進行這個計畫。

雖有上述的研究限制，但這個具先導性質的研究仍有其價值。在理論端，透過實證分析而得的架構，能再次針對行動者世界觀與社會形構間的關係進行對話，亦可作為後續地方研究的參考；在實務端，作為地方創生政策中的重要行動者，了解地方工作者的實踐對政策的規劃與落實必然有幫助。

參、成為地方工作者

一、時勢與英雄

在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Q反問：「你覺得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對此，依照形構分析的取徑來說，應是一個互相影響的過程。不同行動者有不同的生命軌跡，依各自的需求與他人互動，而這個交織而成的形構又影響著個人。而本研究的目的在了解這個互相影響的機制。我們可以從一些受訪者的敘述，一窺行動者與其所處社會的各種碰撞，由此展開分析。

新聞報導的個案（蘋果新聞網，2018）：

2016年時，臺中市公有建國零售市場拆遷，新聞報導一位投入紀錄市場文史的工作者，論及為何投入地方工作：

「我不會拍影片也不會剪片，但建國市場就是我的母親，在被夷為平地之前，我要奮力一試，我可以做點什麼，向她告別。」攤商之子、新書主編詹秀珠買了一台家用攝影機，拍攝市場喧鬧的聲音、食物的香氣、節氣的

美食、攤商與客人的互動，紀錄片作品名為《叫太陽起床的人》，樸實呈現市場的人情味與信任感，詹以素人之姿拿下台中市金導獎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但這只是做為她紀錄者的起點。（蘋果新聞網，2018）

受訪者 F 的例子：

受訪者 F 是一位二十多歲的男性，大學畢業後投入職場，在金融業工作一段時間後，投入朋友開設的啤酒廠工作，受訪者的工作便是藉由參與地方活動、進行田調工作等了解在地，將商品融入在地元素並依此規劃行銷宣傳。當問及為何作出這樣的決定，他說：

這完全是一個因緣際會啦，因為金融工作環境我不喜歡，那個環境產生不了太多有機的生活，所以我其實就是...你可以保有自己的自由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有一個彈性啦。這種東西在金融業是不會發生。所以就毅然決然，在滿年輕的時候，就還有容錯值的時候就趕快跳出來.....然後我會到酒廠上，剛好是機緣啦，因為自己愛喝酒，最大的目的就是那邊酒水我就可以喝免錢，這是很直接的誘因啦。第二個誘因就是至少在台灣啦，在地啤酒廠是可以發展的。

受訪者 G 的例子：

受訪者 G 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性，在桃園某地方團體擔任理事長（無給職，任期至 2022 年），進行老建築保存與活化、地方文史藝文等工作。她提到當時因返鄉照顧祖父轉而投入地方工作的過程：

我就剛好我那段時間離職，就是照顧他，在照顧他一年...那一年時間，我其實就完全都在 XX 地方，然後也會推著他去，他坐輪椅然後要去復健，所以我就是...我就是會帶他去一些...去就是附近市區這邊，就那時候就是有覺得說，欸，我們是 XX 人，阿可是對 XX 也不是特別瞭解。那我阿公他其實算是朋友滿多的，有時候在路上就會看到跟他打招呼的阿公，不同

的阿公，或者是在那個附近的地方、診所那邊就是也會有認識的阿公阿媽之類的會打招呼，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聊天，所以等於就是多多少少還是有認識一些長輩這樣。可能也是因為這樣慢慢慢慢的...生活吧？所以也會覺得說，應該要多了解 XX 一點這樣子，然後其實真正會投入是在 2014 年那個受訪者 N 跟受訪者 O，他們辦了 XX 市集，然後同個時間點 XX 團體，他們要舉辦 XXX 藝術節、第一屆的 XXX 藝術節...

從這些故事可見，雖動機與情況各異，但可以發現社會、制度因素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而行動者的動機也似乎可以看見一些核心原則。以下便依循社會制度、個人動機的順序進一步說明。

二、情境與制度的作用

如前述新聞、個案所提，社會的變遷與發展這種鉅觀的變化，雖然令人感覺遙遠，但確實影響著行動者投入公共行動。這類的案例往往可在社區、社會運動領域的研究論文中發現。例如，楊弘任（2010）便指出，1987 年成立新港文教基金會的陳錦煌醫師，其動機便與當時的大家樂、電子琴花車文化對在地鄉親、兒少的各種影響有關；1992 年成立的美濃愛鄉協進會，則是因反對美濃水庫開發案而興起的社會行動*。又例如，莊雅仲（2011）提到台北市永康社區運動的發展，與當時（1995 年）反對道路計畫拆除部分社區公園有相當的關係。

社會變遷所造成的效果，除了在組織層次發生，同樣也影響著個人日常。前述建國市場的拆遷便是一例。對詹秀珠而言，「建國市場就是我的母親」，在這樣的認同與情感下，拆遷觸發了她一連串的行動，除了紀錄片的拍攝，亦

* 關於新港文教基金會的發展另可參考林秀幸（2011）、廖慧娟（2012）對陳錦煌醫師的訪問；美濃愛鄉協進會的發展亦可參考美濃愛鄉協進會網站（2013）。

有傳統市場導覽、線上社群的串聯（看見建國市場）、專書出版（詹秀珠、黃子倫主編，2019；余立、李佳懷、林建鋒、林煥文、張惠倩、詹秀珠、蘇丞斌，2020）等。這些行動讓更多人認識建國市場，也串連了更多的行動者：導覽活動需要攤商的參與，影像文字的紀錄也是集體合作的成果。經歷這些行動，詹秀珠的身分與時間的分配也從上班族逐漸往地方工作者移動。

在制度（institution）層次，除地方創生政策外，歷年政府推動各類吸引青年投入鄉村的政策，提供行動者許多誘因。據高宜凡（2019）整理，歷年相關政策包括漂鳥計畫（2006年，農委會）、農村再生計畫（2008年，農委會）、大專生洄游農村計畫（2011年，水保局）、青年社區參與行動（2012年，青年發展署）、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2014年，文化部）、原住民青年返鄉體驗工讀計畫（2014年，原民會）、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2017年，教育部）。除此之外，各地的文化、鄉土、社區營造等相關計畫（非僅限於政府經費，也包括民間自辦的種種計畫），亦透過各類的活動讓人認識在地、觸發投入地方工作。

相較於社會變遷以觸發的方式影響行動者，各種政策也以不同形式發揮作用。循序漸進的培養有興趣者投入地方是一種形式。以漂鳥計畫為例，行政院農業委會網站介紹該計畫分「漂鳥營隊」、「漂鳥築巢」、「漂鳥圓夢」三階段進行，首先以體驗營的方式吸引有興趣的民眾參與，接著針對有意持續投入的參與者，政府陸續提供技術、資金等方面的輔導措施。這類的活動透過一連串循序漸進的措施讓參與者投入鄉村。

除此之外，各類政策、計畫在執行過程中舉辦的各種小型活動，在日常生活層面觸發行動者。如受訪者 G 的例子。其因家庭照護需求而待在家鄉開始接觸社造相關活動。某次參與地方市集成了其投入地方工作的開端、讓受訪者 G 的動機與實踐得以持續發生。這種情境的觸發在本次的訪談中相當的常見。

以目前的資料觀察，這類小型活動若在內容上加入討論實踐方案的流程，有助參與者進一步成為地方工作者。受訪者 A 是地方環保團體的主要成員（志工、無給職），從碩士班就讀期間便參與該環保團體的成立與運作，而畢業、退伍至今，他選擇的工作也都與環境、食農議題相關，就其說法，他希望這些工作能學習到相關技能，讓他更能推動該團體的發展，也希望正職工作的時間能夠不影響其參與該團體的運作。研究所時期參與的二場活動，他認為是觸發他投入地方環境事務的起點。其一是都市計畫拆遷戶的分享會，該分享會談到在地古建築保留失敗的經驗；另一場導覽活動則介紹其住家附近的千年茄苳樹，他說：「那時候覺得自己蠻慚愧的，所以想要為了...就是自己的生活環境做一點事情這樣」。至於具體產生行動的事件，則是參與另一場河川導覽的活動。該活動在結束時安排了討論實踐可能的時間，導覽員也鼓勵參與者提出行動方案。受訪者 A 所屬的團體便是在這個討論中成立的。

學校作為一種制度，其影響的方式是長期的社會化過程。從目前蒐集的資料來分析，以大學為例，可粗略將因素分為課程相關與校園生活二者。當然現實中校園內的各種因素互相影響，而校園亦非孤立個體，與社會、政策、個人生命歷程等亦相互交織。

首先在課程相關的部分。與地方工作相關的專業訓練常見於建築、景觀、農業、社工、文資等相關學門中，地方實踐的思維透過課程等方式傳遞給學生。例如，楊弘任（2010）便指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師生，早於 1990 年代社區總體營造發展之前，便帶著批判式規畫思維投入地方的改造。

我們可透過受訪者 N，了解大學教育的影響方式。談到於南部某大學建築相關學系求學時，N 說：

我們一年級的課，就是老師們會希望我們進到社區裡頭，所以我們最後一堂設計課就是、設計作品就是丟到社區裡面跟社區協會，住空間的改

造……另外一個就是叫做田野調查，然後就是一到三年級都會參加，然後就是每一年就會選一個地方，三天兩夜去住在那個地方……甚至我們畢業很多學長姐，其實都是在各地都在做地方、社區的工作，包含像可能 XX、XX 的人，然後或者是一些在地的前輩，他們其實都是我們系上畢業的學長姐的，那他們也會因為他們自己接的那些案子……（問）我們系上學生有沒有興趣去 XX……那邊去參與社區營造活動，一天的，那我們就會去那邊，跟那邊社區一齊完成那個社區的公共空間的改造的這些事情…

另一方面，對於這種訓練方式，N 抱持相當正面的評價：

我其實很喜歡。我覺得對我來講，我會覺得說，上課不應該要在教室裡面上，就是拉到學校外面其實是一個…你直接到現場感受到真實的東西，那另一方面，其實我也是可能比較喜歡到處跑，因為我覺得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那這些東西都可以刺激我在我想事情或是觀察到，或是我覺得就是不同地方，他有什麼樣子符合在地的一些有趣的點…

大學畢業後 N 回到北部相同學門的研究所就讀，退伍後的相關工作，也多與碩班時期的教師、學生保持合作的關係。

從這段敘述得知客觀情境與主觀傾向的交互作用。學校的訓練模式吸引特定偏好的行動者，而持續訓練加上相關資源得逐步累積，又讓行動者能持續投入地方工作。

第二個主軸是校園生活，如社團、工讀等。我們可以從地方勞動議題團體甲（匿名）的形成過程加以觀察。本次訪談到該團體的三位成員，其中 E 與 J 可說是該組織創立的要角。大學時期於人文學科就讀的 E，認為未來就業的不確定性，讓系上學生間有種嘗試的文化，也就是於課外找尋各種能應用所學的方案；E 也同樣的參與校內、校外各種文史相關的活動。隨後，因希望學到更多應用知識，E 選擇南部某校與文化相關的研究所就讀，並利用交換學生的機

會，到國外了解各種對於社會議題呈現的方案。回國後，E 便以在地的勞動議題為主題，開始嘗試各種倡議行動。在一次參與公共議題活動的場合，作為觀眾的 J 認為這樣的模式是可以持續運作的，因此開始與 E 討論發展的可能，最後衍生出一個關注勞動議題的在地團體。

J 與 E 就讀相同的大學，J 就讀大學時，除了課業，最主要的活動便是在校內、外工讀，以及參與新聞性社團，就 J 的說法，他很認同該社團，投入許多精力在社團的相關活動。他運用校內工讀的機會了解到學校的各種動態，對各議題做了一些報導，同時學習認識國內各種主流、非主流媒體的議題處理方式。這些經歷讓他極度認同報導與倡議的正向關係。因此，在那一次參與活動時，看到 E 的分享，認為這可以是持續倡議的議題，便開始與 E 進行後續的組織、倡議活動。

合作初期她們除了用各自的工讀或獎金等在社區租用了一間辦公室外，也常與學校的新聞性社團保持互動合作，讓組織工作得以持續。

從這一個勞動團體的發展脈絡來看，校園的文化、各類的活動，甚至工讀的機會，都有可能讓行動者產生地方工作的動機，也提供這個動機持續下去的資源。

從社會變遷到校園生活，這些觸發因素可說偏向由外而內，不可忽略的是，行動者本身的生命經歷也是觸發行動者投入地方工作的原因。對勞動市場的不適應以及本身社會身分轉換產生的不同需求，是本處所要討論的二個主軸。

若說接受科層化的職涯生活是社會化的過程之一，則此機制並非全覆於所有行動者身上。總有行動者不適應於科層制的生活方式。前述受訪者 F 的因緣際會其實仍是理性思考下的行動。在訪談的過程中，他提到了在科層組織中的不適應是導致其投入目前工作的主因，進一步討論時，可見到他發揮金融管理的專長，分析投入地方啤酒產業的前景、目前服務單位的優勢劣勢、以及其本

身目前的條件優劣。就其估算，該啤酒廠所座落的城市有相當多的文史素材可供發揮、加上業主對啤酒釀造有相當的技術，前景相當樂觀，且自己尚年輕並有一定的經濟儲備、目前的工作自主且有彈性，得以讓他脫離傳統科層就業生活，投入目前的工作。

對受訪者 K 來說，投入地方工作，與她成為人母關係甚鉅。受訪者 K 目前成立一家公司，主要從事地方農業行銷推廣的工作。在此之前，食品相關科系畢業的她投入國內知名餐飲業大約 7 年，在結婚生女後，她希望讓自己的女兒像她一樣，從小接觸許多自然的環境，因此她原本希望開設一家專賣有機食材的餐廳。當時她與大學時期認識的教授談到此一規劃，該教授正好在執行地方食農的計畫，因此邀她先加入計畫，拜訪各地的小型農家。隨後 K 陸續在各大專的食農計畫中工作，有相當豐富的經驗之後，她開設目前這家公司。因為希望給女兒有更多接觸自然的機會，K 從一般企業員工轉而成為地方工作者。

從前述的分析可以看見個人動機與社會情境對於行動者投入地方的影響。從鉅觀層次、政策與制度到個人的生涯，社會因素或急或緩、或重或輕的觸發行動者動機並產生行動。當然，並非所有行動者處於該情境便會產生同樣的行動，但這些的確是讓行動者意識到在地事務對其個人意義的影響因素。同時，具地方意識的人也不一定皆會產生行動，而上述的這些情境對觸發行動來說有其作用。由此可見英雄與時勢互相促成的關係。

更具體的來說，除了觸發外，社會情境產生的作用可讓行動者的動機更為具體：了解自己想要投入的議題、可以與誰一起採取哪些行動。這個過程能從受訪者 M 的敘述來觀察。受訪者 M 目前於中部某大學博士班就讀，同時也是前述地方勞動團體甲的成員。在博士班就讀期間，M 參加一些在地的導覽活動，幾次活動後，他加入該團體。談到這個過程，他說：

.....我們對這些所謂的勞動議題關注可能很少。然後發現到前面有很多人做過一些事情之後那也想要就是...看他們怎麼會...怎麼做？就那時候，其實還是在看，然後在團體甲的時候就是看到它有一個可能行動的方式，所以就跟著就是一起去採取行動。然後我其實原本也沒有預設說，要特別做些什麼事情，可能就是在導覽的過程裡面...然後一邊...可能用我自己本身有一些政治的專業，然後可能在導覽過程之中，我可以去幫忙歸納、分析跟介紹.....好像也發現說，欸，好像真的我們開始要去討論說，未來可能就是（討論）團體甲的方向的時候，就是有一個研究人員幫忙做...可能計畫的綜合、一些背景資料蒐集，然後怎麼樣去討論說，這些行動他的後面又怎樣的...就是期許，或者是我們認為他可以發揮的影響力.....

M 從單純的參加活動，進而以自己的專業背景參與相關議題的討論，接著成為該團體的成員。在這個過程中，M 了解到相關議題的內涵，而自己能做些什麼、能與誰合作這些部分，也在互動的過程中逐漸明朗。

三、動機與後續行動（核心的原則）

訪問受訪者為何投入地方工作時，受訪者都能舉出一些支持的理念。這些理念相當多樣：應該多認識自己的家鄉、認為在地的勞動、環境、社福、建築與空間等議題有需要改變之處，或者覺得科層組織無法讓自己的理念有所發揮、因為興趣而投入地方工作...各種理念都出現在本次的訪談經驗中。

從表面上來看，「對公共議題有一定的關懷」仍然相對空泛。進一步分析這個從關心轉成為行動的過程，可以找到一個較為深層的軸線：自我實現。

首先是對自主性的追求。受訪者往往對「在科層組織中工作」有所保留，大多以接案或自行成立組織的形式進行實踐，而究其理由，自主性是重要原因。

受訪者 F 的例子便最為明顯。他目前在地方的啤酒廠任職，進行田野調查找尋在地素材融入其產品、行銷、設計中。當問及其投入理由，除了興趣之外，最明顯的便是對科層組織的排斥。雖然其目前仍是受雇於組織之中，但：

一開始，其實這家酒廠剛開的時候，分工也不精細，是慢慢切切切，把他切出來，那像以我來講，我們一直都沒有聊到的，我的角色在公司是什麼？其實很好玩，我一開始進去，我的目的就是先轉換個工作狀態，然後又有免費的酒，就是剛剛講的誘因，後來發現，欸，這份工作可以有自由，但是公司涉獵在地的素材，跟議題似乎有點不足所以我就慢慢一邊溝通一邊...，有點像是在酒廠裡面做田野，很好笑，你就訪談老闆，你的想法到底是怎樣？你想把這家公司長成什麼樣子？.....我慢慢逐漸的從雜工的角色，慢慢涉獵到可能我要出企劃，做一些在地的資源的盤點.....

進一步的說，這種自主性的追求，不只是目的的達成，也包括行動的方式。是一種，「我想要以我的方式實踐我關懷的理念」的方式。具社會工作專業的受訪者 C，目前於馬祖從事長者關懷、社區工作等，過去也曾在各社福團體進行社區社會工作、兒少關懷等工作。既然關懷的議題相同，為何選擇自行投入地方工作？其說道：

我覺得機構的話是這樣，就是說，在機構的話我覺得那個權限確實是比較限制，還有就是因為我覺得是制度這東西是兩面刃啦，就是說一方面還有制度，可一方面彈性就比較小，然後，也就是相對性的，都是你現在的工作，其實彈性很大。應該基本上是說，如果我有什麼東西想要做的，基本上只要不需要用到社協的錢，我想做什麼都可以做...（研究者問若再重新選擇一次工作模式）我還是會選擇自己開業，就因為自主性比較高，對很多東西的決定權阿什麼的，就是我是可以比較按照自己心意去做。

又或者受訪者 N 的例子。受訪者 N 目前與受訪者 O 共同成立生活設計公司，從在地推廣永續生活是該公司的宗旨。當訪談問及若有類似公司招募，是否會去該公司任職時，他說：

...那如果真的有人邀請，對我來講我還是會希望是用兼職的方式，就我還是希望可以保留一定的彈性可以做我在這個地方做的事情，就是不論是很緩慢的在進行也好，就是對我來講，反正還是有一定的彈性跟空間，至少我可以決定我自己想要過的...生活，或是我如何把我周圍、我的生活營造起來，就是我没有...也沒有完全排斥說，要去別的地方去吃人家頭路，可是我並沒有想要完全的進到，別人的公司底下去做這樣，那那個關鍵點就是我覺得沒有辦法完全的主導我自己想要做的東西，畢竟上面有一個可能老闆，那老闆他有他的想法，那如果他對業主，可能不是那麼 OK 的話，我還是得要配合，那我就覺得做的並不是那麼開心這樣，如果全部的我的工作都只有這個的話，我就是不開心。可是，如果今天工作可能只有，可能六成是那個，或是五成是那個，阿剩下的四成跟五成是我自己做自己想，那我覺得我的心情調適上會比較好一點，大概是這樣。

對於「我想要以我的方式實踐我關懷的理念」的概念，也可以從對於地方創生政策的對話中發現。在我進行邀請訪問時，有些受訪者便表示不認為自己屬於地方創生政策下的對象，但就我的觀察，受訪者做的工作有助地方感的增進，也常主動參加甚至被邀請參加地方創生相關活動。對於這種主觀／客觀的差異，受訪者 F 表示：

沒有啦，我不在乎他們想什麼，反正我們就是想把家裡面搞成一個我們想要樣子，就這樣啊，我管它什麼地方創生，我想要這種生活，我會把我家這邊搞成這種生活，就這樣而已，這是個很...很強而有力的回覆，就是我不在乎阿。

另一個具體的例子是受訪者 L。受訪者 L 從大學時期開始投入勞工運動，而近年從勞工運動擴展出地方工作、社會運動等軸線。談到他的地方工作部分與地方創生政策的比較時，他說：

我們當然也可以不用理他，但我們也就是使用。你要我帶這個帽子，也沒有不行啦。我覺得，很早就大家都是這樣，反正就是，能夠讓我想要做的事情往前推進，反正我戴什麼帽子，我都無所謂的。

從這些例子可以發現，地方工作者的投入動機雖紛雜多樣，但更深層的共同點在於這個動機與行動不只是一種關懷，更近似於一種自我實現的過程。「我想要以我的方式實踐我關懷的理念」，他們對關懷的公共議題作出行動，組織自己與身邊的資源，從過程到目標都希望朝自己期望的方式前進。

若從社會分類的角度來看，這種自我實踐模式的特殊性在於跨界。首先是個人與公共之分。社會大眾的分類上，公共事務與個人事務有其界線，而公共一詞對不同群體來說亦有不同定義。照楊弘任（2014：20）所言，村落生活中的公共行動，帶有動機與道德的意涵，也就是說，「公共的」必須是「道德的」（具利他性質的）、需要行動者動機純潔無瑕，因此常與義務勞動相關；而公共行動社團眼中的公共，則是在概念上先行界定的，也就是說，某範疇或領域被定義為公共，這類範疇或領域中的事務就是公共事務。對地方工作者來說，自我實踐的行動跨越個人與公共的區隔，也在不同意義的公共範疇中移動著。第二種跨界發生在經濟與非經濟的區隔上[†]。對一般民眾來說，經濟有其邊界。例如，在村落生活中公共事務帶有無私的性質，也就是說，這些行動通常不能與經濟收入有關。但地方工作者往往需要在其實踐行動中獲得經濟收入，由此便產生了跨界的現象。

[†] 經濟與文化分類的討論可以說是新經濟社會學中主流的議題，相關論述可參考 Zelizer（2010）。

就目前研究的觀察，面對這種跨界的特殊性，對地方工作者的實踐產生了正、反向的影響，而地方工作者則或多或少帶著實用主義的原則進行實踐，也就是在面對各類區隔的不同邏輯中，找尋各種資源、顯示其正當性或弱化社會對其正當性的要求、與其他行動者串聯或有所區隔...透過各種方式達成其實踐的目標。

肆、持續投入的社會機制

至此我們已經了解地方工作者的投入動機以及相應的社會結構，並指出「我想要以我的方式實踐我關懷的理念」可以說是貫串這一類行動者的相同處，但這又延伸出下一個問題：持續地、有組織的行動如何可能？

地方工作的實踐與組織有其困難。畢竟地方工作往往在經濟收入上較不穩定，而地方工作者對其理念與達成方式也有明確的方向。相較企業可透過科層體制與薪資雇傭，不管員工的理念為何，要求員工達成企業目標，但地方工作者要擴張組織，便需要找到理念相同且願意共同承擔經濟風險的夥伴，因此相對困難。某位受訪者便認為，若是文字工作，相較團隊合作，獨立作業是比較有效率的。對於團隊的運作，他則有以下的觀察：

為什麼就是很多人都是苦哈哈，啊你就苦哈哈加上你又不斷有衝突有爭執，那自然而然就會搞到一個因素...就是說，老子不幹，就真的是這樣子就是，啊...我就沒有那些收入嘛，我為什麼還要付出那麼多，我當然是直接去外面找工作還比較划算。加上往往，那個時候就是...怎麼講...我講一句最直白的啦：我認同這個組織但組織不見得認同我，嘿...很多我這樣接觸下來，很多參加的人往往都會產生這樣的狀態，就是我認同這個組織，但是組織不見得認同我，這個就是有的時候，我出去，講說，我是哪個組織，哪個

組織的，就會有人講說，阿你就不是啦。這種感覺啦，這當然會讓人家傷心阿，就是說，我為這個組織付出這麼多，結果到最後你不認同我，那自然而然就是解散。

但，對照前文受訪者 AC 的情況可知，獨立作業也是相當耗費心神的，無法組成明確分工團隊造成了持續實踐的困難。持續的投入地方工作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有意投入地方工作的人是如何發展出生存之道是值得討論的。更進一步的，這些互動的模式從在地的層次來觀察又是什麼樣貌亦必須討論，因為這是地方工作者直接面對的環境。

一、地方工作者身分的正當化

「我想要做什麼」對受訪者來說可能相對明確，但對其他人來說，「你是誰、你在做什麼、你該做什麼」並非如此。社會身分影響著受訪者的行動。通常，面對別人的提問，僅簡略的說自己在做地方工作，正當性並不高。如受訪者 L 便提到某位從事社區工作的同仁：「他好像必須要在職業上、價值上，然後做出一些這個天人交戰的選擇」，畢竟該同仁除了面臨經濟上的焦慮，也需要面對周圍親友的想法。儘管地方工作者往往需要透過從事各種工作來獲得經濟上的穩定，因此擁有多重身份讓行動者面對疑問時有因應的辦法，但整體而言面對他人或甚至自身對「你在做什麼」、甚至「做某某工作才像樣」的發問，是地方工作者必須去因應的。

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制度提供了緩衝的機制，學校便是一例。學生身份讓行動者有自由探索的空間。在問到年輕時對未來方向是否有猶豫時，受訪者 L 表示自己一直沒有特別需要在社會運動或從事受薪工作上做出選擇，他一直在一種廣義的助人專業上探索與成長。在這段對話中，受訪者 L 提到，除了當時

社會整體經濟情況較佳、家庭經濟亦尚可以及沒有立即的就業焦慮之外，學校也有緩衝的作用：

中間有沒有猶豫，有猶豫。但是有這個我們實話說，就是說，他在另外一個被打造出來的小...小試管中，可以度過這個曖昧期。那個小試管是什麼？就是 X 大 X 研所。我可以透過研究生，碩士生的身分、透過博士生的身分，讓我暫時不會被主流的價值觀所扯到支離破碎。你知道嗎？在我周遭的人際關係包含特別是親友的關係當中，有一個研究生的身分...你有一個研究生身分。然後對這個社會宣示說，我們還在發展中阿，而且還是在向上發展中以你...你以為的向上發展中阿...

通常在一定的時間後，地方工作者的身份漸漸明確，也開始帶來正面的作用。地方工作者透過一次次的事件建立關於自己身分的訊號，而其他行動者也依此訊號與之互動，例如地方政府所託進行文史工作、擔任相關活動的講師或代表等，都讓地方工作者能夠持續進行實踐；另一方面，一般民眾也逐漸了解其工作，讓地方工作者的工作較為順利，例如，受訪者 D 便指出，當他去拜訪店家表明自己身分並想了解該建築時，店家便會以比較開放的態度讓其受訪；而據我的觀察，受訪者 D 因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在各單位較少舉辦導覽活動的淡季，他仍可以自行舉辦收費導覽活動，彌補活動講師收入的降低。

除了向他人確立「我是地方工作者」這個身分外，地方工作者也會透過取得各種身分來增加自己實踐的彈性或與相關制度扣連。就我的田野經驗資料，這些行動粗略可以分為以下幾類。第一類是投入程度的轉換。從事地方工作並非皆有穩定的收入，加上行動者自己亦有生涯發展階段的變化。因此，地方工作者可能在全職投入、兼職投入、擔任志工、參與活動...等不同的位置中轉換，在條件允許（收入足夠、心力與資源足夠）的情況下可能全職投入地方工作，若受各種因素限制，則轉換到其他身分以維持實踐與生活的平衡。第二類則與

讓實踐工作的拓展有關。例如：社工師、社大講師、公民記者、認證導覽解說員等個人的身分，可以讓地方工作者增加實踐的正當性；團體層次的身分資格取得也讓地方工作者得以申請政府或民間單位的委託案，就我的觀察，商業團體、社團協會、文史工作室...等，同一團體可能同時具有不同身分，藉此讓行動得以拓展或是獲得經濟收益。

綜上，在獲得明確身分訊號（或身分的正當性）前，行動者可能透過其他身分維持自己行動的拓展，而當「地方工作者」身分對自己以及他人來說逐漸明確後，則可能帶來一些正面的作用。在此同時，地方工作者也會調整與取得各類身分，讓自己的實踐工作得以持續。

二、獲得資本

隨著事件的展開，不論是參與地方活動或是舉辦活動，地方工作者逐漸累積相關資本，形成較穩定的實踐模式。下列是受訪者 K 在辦公室接受訪問時，介紹牆上展示的淨川活動成果的對話。K 從參與大專食農計畫到自行開設公司，文史調查、與農家、社區、大學合作舉辦營隊等工作已有數年，該淨灘活動呈現了這些行動所累積的資本：

...可是怎麼跟在地這樣連結起來？我覺得，那真的是運氣，剛好（辦公室）隔壁就是住主委，我前面就是社區發展協會的資深會計，然後帶我來住這邊的人，跟我們協會的理事長非常的熟.....里長剛上任，然後，里長陪我去邀，他們都來，然後我們又發了一下訊息，在地的立委因為有想要推地方慶典，然後也來參加.....然後就辦了一系列，然後這是在社區辦營隊，然後我們就是從這一個 XX 圳開始。

其實我之前就去做調查，我覺得這邊是非常非常合適做社區的親水營造，就是開始找 X 大的老師在做，然後就因為這個營隊然後帶大家去認識，大家都看到（活動參加者）都有穿制服的在地的，所以，里長就又更認真在推這個，然後，我們又幫社區就是做了一些在地的文史調查，對，把小孩帶到社區裡面去。他們看到小孩看到希望……我們就從那個營隊開始，然後再串到現在這邊，然後我們就是因為我現在剛好 XXX 當 XX 會會長，一個時機點全部都在一起了。然後，里長知道我們要辦淨溪，我就把 X 大 USR 的資源帶進來，然後我去號召這些企業加入的社團一起來，然後鄰長他又剛好跟那個 OOO 旅的旅長，OOO 的旅長，搭上線，所以就又號召阿兵哥，全部就一起來做。這一場的本來只預計要辦 80 個人，後來來了 200 多個…

淨川活動相當成功，而串連的過程也不僅如受訪者 K 謙稱般的只是運氣。這個活動體現了地方工作者所累積的三類資本。

第一類我稱為「地方資源」，也就是對地方創生政策中所強調的地方特色。資源盤點是常見的起手式，地方工作者藉此了解在地資源及特色，因地制宜擬定行動方案。經過長期累積，地方工作者對在地各個面向都有一定的知識庫存，這些知識庫存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行動而呈現，地方工作者由此獲得收益，而不論在地或外地的活動參與者因此對在地有更多的認識，活動參與者也因此對該地產生了價值。

第二類資本是地方網絡。地方網絡指的是在地的人士，例如文中提到的社區發展協會、里長、立委、商業社團等，當然也包括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員等。這些行動者可以動員在地民眾參與活動，或是提供、引薦完成活動所需的其他資源（例如申請活動場地、擴大在地宣傳…等）。

第三類資本是協力網絡，這裡指的是技術或知識的提供者。受訪者 K 提到的大學教師便可以說是知識的提供者，其提供了親水營造相關的知識與經驗。

而技術的提供也是重要的，例如地方報的發刊，便需要設計、美術、文字、攝影、採訪...各種技術，地方工作者個人或是小型的團體，往往無法顧及所有面向，因此便需要各種專業者的合作。

地方工作者便運用、組合此三類資本進行其實踐。除了運用自身的專長、經驗、地方知識外，地方工作者本人在這三類資本間，扮演橋樑的角色[‡]（實務上常以「平台」稱之）。以前述受訪者 K 舉辦的淨灘活動為例，這個為了達到其長期目標（親水營造）所舉辦的活動，除了受訪者自身的在地知識派上用場外，其人脈（協會、里長、軍方、大學等）的選擇、串聯、擴散也是促成淨灘活動成功舉辦的關鍵因素。

三、行動的維持與鎖入效果

當然，實踐行動並不總是如此順利，這些資本還是有消逝的可能。因此，本部分繼續追問實踐行動如何維持。

（一）社會技術（social skill）

Fligstein（2001）曾提出社會技術此一概念，有助我們了解市場規則中的能動問題。社會技術指行動者促成其他行動者進行合作以形成集體行動的能耐。在此我們以這樣的思考方式來進行分析，提出三類社會技術。

首先，彈性組織。小型組織雖然有其缺點，但充滿彈性是其優勢。如受訪者 N、O，雖有成立公司，但仍與學校教師搭配，以兼職計畫人員的身分共同經營一個在地文資據點。另外如受訪者 C 的發展情況：

[‡] 本處所指橋樑的概念，可參考 Burt（1995、2005）關於社會網絡、結構洞以及如何連結不同網絡的討論。

我最一開始來是接文化處的案子，然後那個是由我們自己的工作室叫做XXX工作室接的，對，那後來就是反正，我來接這個，老人共餐，就這個C據點的...算是方案吧，對然後這算是社區發展協會接的方案，所以可能我同事，他們都對外宣稱就是我單飛不解散的這個概念.....

這種彈性的組織不僅可以快速因應外部機會，對於地方工作者強調自主也有所助益。受訪者AC曾經提到在實踐的過程中與很多地方工作者合作密切，而我追問為何沒有因此形成一個更大的團體時，她說：「因為大家還是各司其職阿，就是有自己的事情、想做的理念、想做的方向吧」，她進一步提到，相較於合夥，合作的關係較為簡單，就她觀察她認識的各個團體也大多以合作的模式互動。

第二，尊重自主。自主是地方工作者強調的元素，而對此價值的尊重，不僅在對自己的工作選擇上，也在對合作夥伴的對待上。如受訪者O所提：「我覺得再怎麼好的夥伴必須透過多次的合作，他才會產生出默契」而這種關係的建立，除了能力的互補外，互相尊重對方想發展的事，是訪談中常聽到的原則：

那我就丟案子給他們去做也好，或是像我們長期以來跟一個學弟...像我們地方報什麼也是找他畫，這些的過程都是我覺得透過像這樣子的互信的基礎，然後去讓他們在這樣子的案子裡面發揮他們的所長。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比較重要，就是不要讓他們覺得，好像只是為了做一個案子，然後畫一個對方要的東西，反而是我希望他把他這件事情變成是他真的，他有他的想法。然後我來反過來，從他的就是這個大的方向下把他的想法涵蓋進來去做，一個延伸就是我覺得這樣，對他來講，他們也會有成就感，那，這個對我來講是一個，我不論做任何事情都還是希望用這樣的基礎去跟這些夥伴聚合作，就不會變好像真的非得有我們，就是掌控慾非常強，

要求每個人都配合這件事，我覺得，這並不是我們在跟我合作夥伴、討論或是合作上的初衷……

這種論述在受訪過程中經常出現，不僅是受訪者希望受到這樣的對待，也希望如此對待他人。

第三，共好。這包括互相幫助找尋、介紹機會等。我在中部進行田野工作時，時常聽到地方工作者以「大家庭」來描述在地的地方工作網絡，各類活動中也可見到不同團體彼此合作、互相支援；同時，彼此引薦工作機會也是常見的情況，我在田野工作時，便曾被詢問是否要參加與我相關的有酬座談活動。這種共好的互動模式不僅只在機會的分享，也在於網絡的建立。在訪談受訪者N、受訪者O、受訪者G時，她們皆選擇在地的一家簡餐店用餐進行訪談，據受訪者G說，這家簡餐店老闆搬來這邊是希望兒女能夠以他們想要的方式成長，而老闆夫婦也常投入社區工作，受訪者G說：「他們才是真正的地方創生」。在無工作交集的日常生活中，地方工作者仍然保持共好的原則，促進網絡與機會的建立。

就目前的研究資料分析來看，上述三項社會技術讓在地的地方工作生態保持運作。與「我想要以我的方式實踐我關懷的理念」這種自我實現的模式相呼應，彈性、自主、共好這些原則常見於地方工作者互動、組織行動中。這些原則讓地方工作者之間保持著一種權力對等的關係，在合作共同完成一項任務的同時，也讓彼此能在自己的目標上進行累積。

（二）鎖入效應[§]

接下來是個人層次的討論：為什麼地方工作者不離開？或許為了想做的事情、可能為了自主性，地方工作者並沒有很「計較」得失，如受訪者G所言：

阿就頭都洗下去了，因為我第一年、（20）16年開始去做，掙...我自己掙扎了一段時間，我自己其實是很掙扎，我是不是真的要當計畫負責人這樣子.....因為我就...我那時候就想說算了，來做吧，不管了，因為真的想說要把這個地方可以好好活化，建築可以好好活化起來.....我沒有去特別想對我有什麼好處，我認真說，真的就是...你如果會去計較這些東西的話，很多事情真的做不下去...

但就旁觀察，還是有些因素讓地方工作者持續的投入地方工作。

首先，資本與在地共生。前文提到地方工作者累積的各類資本，都與在地有所扣連，或許協力網絡可以脫離在地，但地方資源、地方網絡，卻有相當的專屬性^{**}。這些資本需要時間累積。

再者，個人層面的正增強。在個人層次，持續投入地方工作，或者說自己想要追求的理念，讓人有自主的感受、團隊的認同與歸屬以及為了達到理念不斷增加自己的能耐，這些都讓受訪者持續投入地方工作。

（受訪者 B 討論受訪者 A 為何願意持續投入環境議題）我用旁觀者的角度，覺得他是一個，不忘本的人，然後...他剛剛應該有提吧？就是〇〇團體的出現，讓他知道說，原來他自己對人生有一個掌控權，他可以決定自己可以做什麼，然後他就持續做，而且身邊很多人在支持、一起做，不像

[§] 鎖入效應（lock-in effect）一詞常見於經濟、管理學領域，意指消費者固著於某廠商所推出的產品、不隨意轉換購買其他廠商之產品（可參考：Arthur，1989）。在本處以此概念作為類比，討論為何地方工作者不會隨意離開期投入的地方工作實踐。

^{**} 本處以經濟學中交易成本論的概念作為譬喻。若一項資產很難於不同情境下（例如不同用途、或是不同使用者）應用，則該資產具有高度的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 Williamson，1975）

以前在求學的時候，你自己要完成每天的學業，然後被丟很高的期待值，人生好像就有一種可能。他在，社會運動，這算社會運動嗎？在這方面來說，他得到...他覺得選擇性更多了，很多人一起做，不是他一個人，他覺得有伴，然後發現他也可以在裡面找到他...可以存在的位置，然後好好發揮學習。我覺得學習對他來說，是這輩子很重要，這地方能不能學習對他來說也蠻重要的，他不管到哪個地方，就說會「我可以學」、「我還不夠好」，就不忘本吧，對阿...他如果覺得沒有這個團體，這件事不做的話，我覺得啦，他好像半個人就不見了，我這麼認為。

（問受訪者 L 為何不去做朝九晚五的工作反而選擇目前的路）應該是這樣說。我從二十幾歲開始，一直到現在，應該是二十...過去這二十五年來，我幾乎每一天都會問，為什麼不走，每天，特別是在更年輕的時候但當時不會是這樣問？應該是問說，我跟運動的關係是什麼，我跟社會運動的關係是什麼？然後以及，我到底在尋求的認同是什麼，有沒有一種想像，的存在是...叫做群眾，這件事情，花了很多年，在分辨這件事。然後想這些問題從來都不是從經濟面的角度，從來都不是，那並不是說我經濟上完全沒問題，而是...我當然還有一些先天的條件，就是我爸媽不用我養，所以在經濟上，其實能夠把自己照顧好就可以了，所以剩下真正會，讓我一直在裡面的原因，我覺得它是一個，變化性的過程，就是說，雖然很緩慢，但是好像感覺，有一些改變在發生，這個改變有可能是放在我工作的對象上。也有可能是放在我自己的身上，所以應該是怎麼講，我大概從二十幾歲之後，我基本上都一直在進步中，就說，我沒有停下來過，進步是什麼？就是說，我對於，我對於事物的認識，然後對於，方法的掌握，然後以及知識的生產，我覺得不斷在進步，即便到目前為止，都還是。

從上述可以發現，不論是持續地方工作所獲得的資本，或是工作過程對個人帶來的感受，這些都形成一種鎖入的效果，讓地方工作者持續其目前的實踐。

四、在地形構

至此，我們可以描繪出環繞著地方工作者所形成的形構。行動者依其各樣的取向而與他人產生互相依賴的關係，各種不同的取向與互賴形成了一個（以受訪者的詞彙來說）「大家庭」。行動者間有各樣的互動關係、角色、互動原則等。這個形構讓地方特色得以發掘、保存、活化。

這個形構主要包括三類行動者：地方工作者、地方特色的需求者、參與者。地方工作者持續的累積的在地知識，轉化為各種形式的創作、商品、服務。在這些過程中地方工作者的身分逐漸確立，除了累積地方知識外，也建立了地方與協力網絡。在每一次的活動中，這些行動者^{††}以主辦者或協力的角色，依事件的需求被動員起來，而地方特色也在一次次的活動中被呈現讓他人得以認識。除了舉辦各種活動之外，行動者間在日常也保持著一定的互動，整體看來形成一種自成一群的樣態。

另一類與此群體保持互動的行動者是地方特色的需求者。這類行動者在需要地方特色相關元素時，尋求地方工作者的合作。最常見的合作形式是勞務外包，也就是本文中常提到的接案。發案的單位則相當多樣，包括學校、社區大學、政府單位、長照據點、社區發展協會、商圈發展協會、個別商家與企業...等，可以說橫跨了社會組織分類中的三大部門。

^{††} 這些行動者除了地方工作者外，也包括了提供相關技術或資源的行動者，也就是那些地方網絡、協力網絡中的成員。

地方工作者的實踐行動也與參與者產生關係。實踐行動包括了將地方特色轉化為各種創作、商品、服務，也包括了地方工作者收集資料的過程。在這些實踐中，在地民眾提供資訊同時也獲得在地資訊，而非本地的民眾則透過各種形式的參與（志工、觀光客、消費者，或是在社群媒體關注相關資訊），對在地產生了意義與價值。這些參與可能讓行動者產生興趣、認同甚至投入地方工作。同時，若地方工作者因經濟或生涯規劃無法繼續全職或兼職的推動實踐工作，擔任志工或是成為活動的參與者，也是與相關議題保持關係的方式。

在此圖像中，可看到不同的行動者各有不同的串連理由。地方工作者為了自我實現，發掘地方元素、組織各類資源而推出各種活動；產官學各界，則因對地方特色有需求，不僅提供各種合作的機會與資源，也在日常與地方工作者保持聯繫；而一般人則因各種社會情境的觸發，產生動機接觸了前述行動者所推出的各種活動，例如對老建築有興趣參加了老屋活化工作坊、想多認識在地因此參加了地方導覽活動等。

同時，這個圖像所包括的不僅是互動的網絡關係，整體的形構也有規範、認知等面向。每一次的活動可以說是這些行動者展現其互動關係的具體情況：哪一個主題是哪一個單位主辦的，哪一位地方工作者是主要承辦者，其他的地方工作者各自扮演了哪一些主要或協力的角色，這些活動又觸發了哪一些行動者。但在此明顯可見的網絡之下，則有各種日常的互動原則的面向。如前所提，保持彈性、尊重自主、共好這些原則，讓這些行動者在確保各自能夠自主發展、自我實現的同時，仍有合作的空間，而共好的原則也在日常中因互相介紹推薦而擴展了地方工作者的發展可能性。另外，地方工作者與地方特色的需求者在日常也保持一定的互動，最容易見到的互動方式便是各社群媒體上的聯繫群組，

或是互相參與對方舉辦的活動，這也讓行動者間了解彼此最近的情況、讓訊息得以流動，並且可以維持彼此的聯繫^{‡‡}。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政府的各種行動也產生影響。文中可見，不僅是地方創生這類直接對應的政策，都市規劃產生的變遷、學校的培訓與提供脈絡、各類地方活動的舉辦...等，這些行動都在預期內或預期外、直接或間接，透過短期的觸發或是長期的醞釀，促成了地方工作者與其形構的形成。

伍、結論

從政策的角度來看，面對人口、城鄉的議題，政府推出地方創生政策，期待在人口外移地區發展在地產業，吸引人口回流，在長期的發展下，降低城鄉的差距。由此，地方的特色、居民，成了關鍵的因素。透過地方齊心協力發展具在地特色的產業，產業得以根植於在地，移入的人口才不至再次移出。在政策推動的過程中，仰賴著一群地方工作者，期待他們所累積的地方知識與經驗能促成政策目標。本文希望了解這群行動者的動機與維持機制，因這些機制影響了政策的落實。

觸發行動者投入地方工作的因素多樣，從突然事件的觸發到學校長期醞釀皆有可能，但共同點在於：展現地方特色或投入在地議題成了這些行動者自我實現中的一個元素，在持續投入的過程中，這些行動者建立了自己的身分、與其他行動者建立了互動的關係與互動的模式（大家庭中各自的專長、角色，以

^{‡‡} 這個總體看來自成一群的形構，內部也有著遠近親疏的關係。就目前所累積的經驗資料來看，若行動者在此形構中沒有角色（其他行動者不知道哪些主題可以一起合作，或不知道該行動者有何專長等）、無法找到資源或專長互補的合作夥伴，或是在互動合作過程中產生負面經驗（如前文所提的爭執、拆夥的情況），自然不易在這個形構中與其他行動者維持持續、緊密的互動；但若處於較邊緣的位置，行動者仍可透過持續找尋合作機會、累積合作經驗的方式，建立自己相對穩固的夥伴關係。

及彈性、尊重自主、共好等原則），同時，這些資本具有地方專有的特性，因此產生鎖入效果讓行動者持續的投入地方工作。

從地方工作的角度所觀察到的形構，也成為一種落實政策的管道。這個各依自身目的而互相依賴的形構不僅讓地方工作者的以持續自我實現的行動，也有觸發有興趣的行動者投入地方工作，這些都對地方創生政策有益；反過來說，政策制定的各種實踐活動，也在這個形構中找尋合適的承接對象，讓政策得以落實。第一部分所提的青年培力工作站便是具體的例子。作為地方創生政策的一部分，這個政策招募已有經驗的地方工作者推廣與傳承其經驗，由此吸引青年留鄉或返鄉。舉辦這些推廣與傳承經驗的活動，便需要在地行動者間的串連與合作；反過來說，地方工作者也需要透過承接此類計畫，除了經濟上的收入外，也藉此呈現自己累積的在地知識。由此，因應人口外移、城鄉差距的地方創生政策，透過地方工作者所形成的「大家庭」累積在地能量，逐步達到政策目標。

本研究發現可對政策落實提供些許建議。首先，形構的形成與發展動態是需要持續關注的。地方創生政策需要長期持續的投入才能看到成果，而在地的形構是否能持續的維持並發揮功能，可說是重要的觀察項目。目前，青年工作站可說已經觸及在地形構的建立，而如何讓其持續，便是接下來必須討論的部分。畢竟各類行動者有著不同的發展方向與理由而在當下互相依賴，若未來各自的發展的方向、理由逐漸分歧（例如經濟壓力讓地方工作者的投入程度降低，或者政策逐漸重產業而輕地方元素等），這樣的形構是否仍能維持，便需要持續的觀察。

再者，未來是否能依賴目前的樣態讓產業持續的擴大發展，也是值得關注的事情。從政策的目標來看，想要透過產業發展促成社會的變遷，可能需要的是頗具規模的產業結構，藉此增加大量工作機會吸引人口留在當地。但目前從

地方特色這個角度觀察到的樣貌，主要還是個人或小型組織所構成的、具有彈性的網絡，而當中的行動者以高自主性、權力相對平等的方式進行互動。二者的邏輯有所不同，畢竟一般來說，具規模的產業所包含的大型組織通常科層化的情況較高，相對的缺乏彈性以及透過職責權力關係來運作。因此，未來如何發展、二種邏輯如何變化，或者地方創生會創造出一種新的組織模式，這些都是未來值得觀察的議題。

此外，本研究對未來後續研究亦有參考價值。透過 Elias 的形構分析取徑，本研究從地方創生的角度描繪出在地形構。雖然本研究在相對微觀的層次進行分析、提出的分析模型相對簡化，但如 Elias 所提的經驗典範概念，這樣的研究仍可供其他研究進行對照與延伸。舉例來說，一個公共領域並非僅有地方工作者存在，如政黨的地方組織、傳統的地方仕紳等各類的行動者皆在同樣的場域中行動。這些可能不同的需求、互動邏輯如何互相影響與交織，甚至如何與國家、社會等更大、更為複雜的形構互相影響，都是值得繼續研究的議題，這些也都可透過本研究所提供之基礎，進行後續的比較、更新與延伸。

參考文獻

- 公益交流站 NPOst 編輯室 (2016)。《城鄉差距究竟有多大？臺灣鄉鎮的 8 大殘酷現實》。資料檢索日期：2022 年 2 月 23 日。網址：<https://npost.tw/archives/24816>。(NPOst Editorial Room (2016). How Big is the Urban-Rural Gap? 8 Harsh Realities of Taiwan's Townships. Retrieved 23-02-2022, from <https://npost.tw/archives/24816>.)
-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站 (2022)。資料檢索日期：2022 年 2 月 20 日。網址：<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Dep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tatistics*. Retrieved 20-02-2022, from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 方媛媛 (2015)。《知識青年的返鄉經驗》。屏東：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碩士論文。(Fang, Yuan-Yuan (2015). *Returning Experience From the Educated Youth* (Master's Thesis). Pingtung: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 行政院(2019)。《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臺北：行政院。(Executive Yuan(2019).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on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Taipei: Executive Yuan.)
- 行政院農業委會網站。〈新農業運動－漂鳥計畫〉。資料檢索日期：2022 年 2 月 20 日。網址：<https://www.coa.gov.tw/ws.php?id=11510>。(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Take Off of Wandervogel Program*. Retrieved 20-02-2022, from <https://www.coa.gov.tw/ws.php?id=11510>.)
- 余立、李佳懷、林建鋒、林煥文、張惠倩、詹秀珠、蘇丞斌 (2020)。《臺中夢的苦難與輝煌：吊腳樓》。臺中：治市仔。(Yu, Li, Jia-Huai Li, Jian-Fong Lin, Huan-Wun Lin, Hui-Chien Chang, Hsiu-Chu Zhan and Cheng-Pin Su

- (2020). *The Suffering and Glory of Taichung Dream: the Stilt Houses*. Taichung: Ye-Shi-Zai.)
- 李美珍、王燕琴 (2016)。〈跨越半世紀－社區發展 5.0〉。《社區發展季刊》，154，6-17。(Lee, Mei-Chen and Yen-chin Wang (2016). Over a Half Century: Community Development 5.0.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Quarterly)*, 154, 6-17.)
- 林秀幸 (2011)。〈新港社區運動〉。見何明修、林秀幸 (主編)，《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363-398。臺北：群學。(Lin, Hsiu-Hsin (2011). Community Movement in Xingang. In Ho, Ming-Sho and Hsiu-Hsin Lin (eds.), *The Age of Social Movements: Taiwanese Activism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363-398. Taipei: Socio)
- 林明禎 (2013)。〈從當代社區的變異初探社區工作者角色〉。《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3(1)，99-126。(Lin, Ming-Chen (2013).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Roles of Community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ation of Contemporary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Work and Community Studies*, 3(1), 99-126.)
- 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花蓮社造中心計畫連結簡易圖》。資料檢索日期：2021年5月26日。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_ZHgNNZLfMQVrdTKk1VPDOmv8uSaz-j/view。(Hualien County Niuli Community Association. *Hualien 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er Project Links*. Retrieved 26-05-2021, fro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_ZHgNNZLfMQVrdTKk1VPDOmv8uSaz-j/view.)
- 《看見建國市場》。資料檢索日期：2022年6月2日。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83614438706648>。(See Jianguo Market Facebook Group)

p. Retrieved 02-06-2022, from: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83614438706648>.)

美濃愛鄉協進會 (2013)。《關於我們－歷史緣起》。資料檢索日期：2022 年 2 月 23 日。網址：<https://mpa.artlife.tw/mall/help-1-1.html>。(Meinung People's Association (2013). About Us: History. Retrieved 23-02-2022, from: <https://mpa.artlife.tw/mall/help-1-1.html>.)

高宜凡 (2019)。《為什麼對年輕人來說，返鄉成了最遠的一條路？》。資料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5 日。網址：<https://city.gvm.com.tw/article/67326>。(Gao, Yi-Fan (2019). Why is Returning Home the Furthest Road for Young People? Retrieved 25-07-2019, from: <https://city.gvm.com.tw/article/67326>.)

高啟霽 (2018 年 01 月 25 日)。《什麼是「地方創生」？這項解藥，能讓寶島不淪為又窮又老的鬼島》。資料檢索日期：2022 年 2 月 22 日。網址：<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6556>。(Gau, Qi-Pei (2018). What is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This Antidote Will Prevent the Island from Becoming a Poor and Old Ghost Island. Retrieved 22-02-2022, from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6556>.)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6)。《中華民國人口推估 (105 至 150 年)》。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16).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the R.O.C (Taiwan): 2016-2061*. Taipei: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中華民國人口推估 (2018 至 2065 年)》。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16).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the R.O.C (Taiwan): 2018-2065*. Taipei: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至2070年）》。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2016). *Population Projections for the R.O.C (Taiwan): 2020-2070*. Taipei: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梁大慶（2016）。〈返鄉定居之居民志願在農村社區擔任志工之參與動機與工作滿足之研究〉。《農業推廣文彙》，61，115-128。（Ta-Ching Liang (2016). A Study on the Motivat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Returning Residents to Volunteer in Rural Communities. *Agricultural Extension*, 61, 115-128.）

莊雅仲（2011）。〈永康街社區運動〉。見何明修、林秀幸（主編），《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331-362。臺北：群學。（Chuang, Ya-Chung (2011). Community Movement in Yongkang Street. In Ho, Ming-sho and Hsiu-Hsin Lin (eds.), *The Age of Social Movements: Taiwanese Activism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331-362. Taipei: Socio.）

曾旭正（2018）。《有了社區營造，為何還需要地方創生？》。資料檢索日期：2020年8月27日。網址：<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361>。（Tseng, Shu-Cheng (2018). *With Community Development, Why Do We Need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Retrieved 27-08-2020, from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361>.)

楊弘任（2010）。〈以社區之名〉。見吳介民、范雲、顧爾德（主編），《秩序繽紛的年代 1990-2010：走向下一輪民主盛世》，87-98。新北：左岸文化。（Yang, Hung-Renn (2014). In the Name of Community. In Wu, Jieh-Min, Yun Fan and Er-De Gu (eds.), *The Era of Various Order: Towards the Next Round of Democratic Prosperity*, 87-98. Taipei: RiveGauche.）

楊弘任（2014）。《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的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臺北：群學。（Yang, Hung-Renn (2014). *Making Community Work: A Case Study of Lin-Bien*. Taipei: Socio）

經濟日報（2021）。《國發會推地方創生 2.0 規劃 5 年 60 億元經費》。資料檢
索日期：2021 年 2 月 5 日。網址：[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
5222790](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5222790)。（Economic Daily News (2021).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will
Spend 6 Billion in Next 5 Years to Boost th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2.0 Policy*.
Retrieved 05-02-2021, from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52227
90.](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5222790)）

詹秀珠、黃子倫（主編）（2019）。《臺中老市場的印記：建國市場的過去與
現在》。臺中：冷市仔。Zhan, Hsiu-Chu and Zi-Lun Huang (eds.) (2019). *The
Imprint of Taichung Old Market: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Jianguo Market*.
Taichung: Ye-Shi-Zai.)

廖慧娟（2012）。〈投入社區總體營造的小鎮醫師陳錦煌〉。《醫療品質雜誌》，
6（1），90-95。（Liao, Hui-Juan (2012). Chen Jinhuang, A Small Town Doctor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Healthcare
Quality*, 6(1), 90-95.）

鄭如雅、李易駿（2011）。〈社區工作者核心能力之探討：專業社會工作者之
經驗與觀點〉。《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1（1），1-42。（Zheng,
Zu-ya and Yih-jiunn Lee (2011). The Core Competences of Professional
Community Workers: An Explorative Research of Taiwan. *Journal of
Community Work and Community Studies*, 1(1), 1-42.）

蕭惠中（2018）。《地方為什麼要創生：曾旭正演講側記》。資料檢索日期：
2020 年 8 月 27 日。網址：<https://www.hisp.ntu.edu.tw/news/epapers/65/art>

icles/238。 (Hsiao, Hui-Chung (2018). *Why Some Place Need Revitalization: Side Notes on Tseng, Shu-Cheng's Speech*. Retrieved 27-08-2020, from <https://www.hisp.ntu.edu.tw/news/epapers/65/articles/238>.)

聯合報 (2011)。〈馬：少子化成國安問題〉。《聯合報》A1，要聞。(United Daily News (2011.01.09). Low Birthrate Becomes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United Daily News*, A1)

莊淇銘 (2011)。〈ㄟ型少子化 國安土石流〉。《聯合報》A15，民意論壇。資料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5日。網址：<https://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8002/g1010509-a.htm>。(Chung, Chi-Ming(2011). Continued Low Birthrate is Like a National Security Landslide. *United Daily News*, A15. Retrieved 15-10-2022, from <https://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8002/g1010509-a.htm>.)

蘋果新聞網 (2018)。《從菜架到書架：建國市場賣菜郎興和衰》。資料檢索日期：2022年9月25日。網址：<https://www.appledaily.com.tw/life/20181229/DVF7UWZEW3ESQ5TXTFSEZHAZYI/>。(Apple Daily (2018). From Vegetable Shelf to Bookshelf, the Rise and Fall of Vegetable Sellers in Jianguo Market. Retrieved 25-09-2022, from <https://www.appledaily.com.tw/life/20181229/DVF7UWZEW3ESQ5TXTFSEZHAZYI/>.)

Arthur, W. B. (1989).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99(394), 116-131.

Burt, R. S. (1995). *Structural Ho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rt, R. S. (2005). *Brokerage and Closure: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apit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resswell, T. (2011). Place: Part I. In Agnew, J. and J. Duncan (eds.).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Human Geography*, 235-244. Oxford: Blackwell.

Cresswell, T. (原著)，徐苔玲、王志宏 (譯) (2016)。《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Cresswell, T. (2014). *Place: an Introduction*. MA: Blackwell.)

Elias, N., and J. L. Scotson (1994).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A Sociological Enquiry into Community Problems (2nd. eds.)*. London: SAGE.

Elias, N. (原著)，劉佳林 (譯) (2005)。《論文明、權力與知識：諾貝特·埃利亞斯文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Elias, N. (原著)，國立編譯館、鄭義愷 (合譯) (2007)。《什麼是社會學》。臺北：群學。

Fligstein, N. (2001). Social Skill and the Theory of Fields. *Sociological Theory*, 19(2), 105-125.

Gieryn, T. F. (2000). A Space for Place i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1), 463-496.

Williamson, O.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Zelizer, V. A. (2010). *Economic Lives: How Culture Shapes the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附錄、研究資料說明

附表 1：研究資料說明

編號	性別	年齡	地區	工作概況	資料說明 (日期、活動性質)	資料性質
A	男	30-34	台中	環境議題團體志工，相關受薪工作亦與環境議題相關	訪談：20180201、20210206、20210408	錄音
B	女	30-34	台中	環境議題團體志工	訪談：20210206、20210408	錄音
C	女	35-39	馬祖	地方工作與長照相關工作	訪談：20210213、20210610	錄音
D	男	25-29	台中	文史工作者、博士班學生	訪談：20210312、20210324、20210430；線上活動參與20210626	錄音，筆記
E	女	25-29	台中	勞工議題社造組織成員，全職	訪談：20210408	錄音
F	男	25-29	新竹	地方特色啤酒廠全職員工，工作為行銷品牌經營	訪談：20210414	錄音
G	女	35-39	桃園	地方組織理事長，有大學研究助理、美容相關等兼職工作	訪談：20210415、20211119；線上活動參與：20210626（公開活動）	錄音，筆記
H	男	30-34	高雄	大學社會實踐計畫駐點人員，全職	訪談：20210421	錄音
I	男	40-44	台中	地方活動志工	訪談：20210422	錄音
J	男	25-29	台中	勞工議題社造組織成員，全職	訪談：20210505	錄音
K	女	30-34	台中	地方農業行銷推廣公司負責人	訪談：20210505	錄音
L	男	45-49	基隆	政治與社造工作者，民意代表	訪談：20210507、20210714、20210823、20210927、20220104	錄音
M	男	30-34	台中	兼職勞工議題社造組織成員、博士班學生	訪談：20210512	錄音
N	男	30-34	桃園	地方工作室成員、兼職大學計畫工作人員	訪談：20210513、20210609	錄音
O	女	25-29	桃園	地方工作室成員、兼職大學計畫工作人員	訪談：20210513、20210609	錄音

附表 1：研究資料說明（續）

編號	性別	年齡	地區	工作概況	資料說明 (日期、活動性質)	資料性質
P	男	20181107		地方工作演講	公開活動	同意錄音分析
Q	女	45-50	台中	地方文史、社會福利工作者	公開活動 20210323 訪談：20211129	同意錄音分析
R	男	20210430		地方工作演講	公開活動	同意錄音分析
S	男	20201029		地方工作演講	公開活動	同意錄音分析
T	男	20201015		地方工作演講	公開活動	筆記
U	男	20201221		桃園社造會議	公開活動	筆記
V	女	20210618		桃園青年局地方創生線上演講	公開活動	筆記
W	-	20210619		USR 線上研討會	公開活動	筆記
X	-	20210620		地方工作者線上聚會	報名活動	僅參與無紀錄
Y	-	20210925		北斗地區青創分享會	公開活動	筆記
Z	男	70-75	基隆	理事長	訪談：20211007、 20211014、20211109	錄音
AA	女	-	基隆	公職、曾任輔導社區發展協會相關職務	訪談：20211225	錄音
AB	男	30-35	國外	曾參與地方工作擔任志工、接案，隨後因移民國外而停止相關工作。	訪談：20220518	錄音
AC	女	-	台中	曾成立團體專注地方文史收集與推廣。	訪談：20220520	錄音

1.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2.資料性質說明：

- (1)「錄音」指有對訪談錄音檔進行逐字稿繕打並進行分析；「筆記」指訪談或參與活動過程中的文字紀錄與個人觀察心得等；「同意錄音分析」指公開活動有徵得講者同意進行錄音與繕打、分析；「僅參與無紀錄」指該活動非公開，故無錄音、文字等紀錄。
- (2)訪談採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的方式選擇受訪者，因此，受訪者皆符合本研究所定義的地方工作者。更進一步說，除了依研究者田野經驗認定外，大部分的受訪者也是當地相關單位（社區營造、圖書館、社區大學）在進行相關會議、實踐時的參與、合作夥伴。因此這些受訪者對本研究來說，具有代表性。